

两周金文 构形演变研究

万瑞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研究

万瑞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研究 / 万瑞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027 - 8

I. ①两… II. ①万… III. ①金文—构形—演变—中国—周代
IV. ①K877.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3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两周金文，上承殷商，下启秦汉，处于古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有很多问题值得不断总结与研究。就其构形而言，近些年古文字学界新秀的硕士博士论文多有所涉及，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万瑞杰博士的这部著作《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著作是瑞杰于2007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补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予以正式出版。瑞杰特意从大连来京，希望我能为此书作序。有感其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欣然承若絮言几句。有关内容，书中已有详细阐述，主要是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供读者进一步了解、认识这位后起之秀。

瑞杰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海滨城市大连，弱冠时喜好篆刻。19岁时承其父业在粮店做了一名售货员，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努力学习篆刻，并不时在当地报刊发表作品，小有名气。由此经人推荐，到了当地政府的涉外宾馆承担外宾及内宾的治印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不怕挫折，竟三次报考函授本科，最后终于如愿，开始走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艺术之路。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他的不断努力与追求，90年代初一举考取了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代书法文献与书法创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学于著名书法家丛文俊先生，并得到著名古文字学家刘钊先生的指导。所撰学位论文《古玺书法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其间所撰写的《古玺研究状况及其对印学界的启示》《古玺文书法饰笔初探》等论文，分别发表于著名期刊《书法研究》与《中国书法》等杂志。

瑞杰深藏的“夙愿”，就是能有机会继续专门系统地学习古文字，为

篆刻与书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幸运”终于降临，2004年他考取了安徽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何琳仪先生。为珍惜难得的“圆梦”机会，他刻苦钻研，经过三年的学习，不仅巩固了古文字学知识及研究方法，还在业师“有威有微”的教诲下，选定了内容丰富的《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研究》这个课题作为博士论文。据说其用意在于：一是巩固所学古文字基本知识；二是为以后金文构形规律的研究奠定基础；三是能将古文字相关学术成果运用于书法篆刻创作中，达到提升篆刻与书法作品的文化和学术品位。期间，他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还发表了《金文“宝”字构形中的文化因素》《殷商金文书法的修饰美研究——兼论殷商金文书法的研究方法》等研究心得。

瑞杰的求学道路虽然曲折，但其追求之精神值得学习，也令人钦佩。现在他就职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担任“书法与篆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近年来，他先后参与和主持了省、市两级科研立项，如辽宁省教育厅的《图像、文献与史境：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大连市社科联的《旅顺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铭文辑证》（参与人）、《大连赋名物文化挖掘及其篆刻作品应用价值研究》（主持人）等。他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能够将古文字学的形义方法与知识融入书法篆刻艺术，多有创作，成绩显著。

这部著作，分为四章，着重对西周、春秋及战国文字构形演变做了全方位的资料整理与分析研究。着力探讨了以下内容：一是，将材料丰富的“两周金文”之主干文字归结为“繁化现象”“简化现象”和“讹变现象”，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提出“有意增繁现象”是两周金文构形的本质特征的意见；二是，在罗卫东教授所撰《春秋金文构形分析总表》附录部分的释字形义方面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三是，对齐、楚、燕、三晋和秦系209个相对齐全的“五系”金文字例进行了形义分析与阐释，得出繁化和简化并存于战国时代，并非完全“战国文字”“以简化字形为主”等结论；四是，在附录部分增加有“两周金文代表铭文”，增强了其实用性功能。他最终归纳出两周金文构形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是：西周金文构形以繁化为主，字体“整齐浑厚”；春秋金文构形以繁化为主，但已开始趋向简化，字体“散逸稚拙”；战国金文构形则以简化为主，字体“简约截取”等。书中有不少独到见解。

可以想见，此书的出版将会受到古文字学界、书法篆刻界、文物收藏界及有关方面读者的欢迎。

黄锡全

癸巳菊月于北京无为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青铜器铭文研究概况	(1)
一 西周金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2)
二 春秋金文的分域研究	(2)
三 战国金文的分域与编年研究	(3)
第二节 对两周金文构形研究的认识	(7)
一 思路的形成	(7)
二 所依据的古文字构形理论	(7)
三 “金文字体”属于古文字构形学研究范围	(9)
第三节 研究涉及的资料以及采用的方法	(10)
一 主要资料	(10)
二 采用的方法	(11)
第四节 操作程序	(11)
一 结构程序	(11)
二 内容程序	(12)
三 技术程序	(12)
第二章 西周金文	(13)
第一节 西周金文的构形	(14)
第二节 西周金文的繁化	(15)
一 有意增繁	(16)
二 无意增繁	(22)
第三节 西周金文的简化	(35)

一 部件省简	(36)
二 笔画省简	(40)
三 合文省简	(44)
第四节 西周讹变现象	(47)
一 独体离析	(47)
二 形近混同	(49)
三 变形音化	(52)
第五节 西周金文常用字与新增字	(53)
第三章 春秋金文	(73)
第一节 春秋金文构形	(74)
第二节 春秋金文的繁化	(75)
一 增添义符	(76)
二 增添声符	(78)
三 增添饰件	(80)
第三节 春秋金文的简化	(85)
一 偏旁部件省简	(85)
二 笔画省简	(88)
第四节 春秋金文的讹变及其地域特征	(93)
一 讹变现象	(95)
二 地域特征	(101)
第五节 对《春秋金文构形分析总表》附录部分 释字的商榷	(105)
第四章 战国金文	(125)
第一节 “五国”金文构形	(127)
一 “五国”金文的繁化	(127)
二 “五国”金文的简化	(135)
三 “五国”文字与楚秦文字特性比较	(138)
第二节 楚系金文构形	(143)
一 楚系金文的简化	(144)
二 楚系金文的繁化	(151)

第三节 秦系金文构形	(160)
一 秦系金文的繁化	(161)
二 秦系金文的简化	(168)
三 秦系金文的特色	(179)
四 战国文字字形对照表(部分)	(183)
结 语	(243)
参考文献	(246)
附录 两周金文代表铭文选	(255)
第一节 西周金文代表铭文选	(255)
第二节 春秋金文代表铭文选	(277)
第三节 战国金文代表铭文选	(283)
后 记	(293)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青铜器铭文研究概况

“20 世纪的青铜器铭文研究，探索出了一条与传统金石学相比更为完善和更为科学的道路，取得了前人无法比拟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近代田野考古。如果没有近八十年来通过科学考古发掘而得的数以千计的新材料，今天的金文考索与传统的金石学大概不会有本质的区别。”^①

考古的新发现在金文研究中的作用可分为两方面：其一，它为金文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原始素材。其二，它在金文资料史料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金文的分期断代与分域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殷墟考古发现对殷商铜器谱系的建立，庄白一号窖藏坑、北赵晋侯墓地等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与标准器对比法的建立与完善，晋侯苏钟、静方鼎及虞遂鼎的发现对“月相”理论的推进，郑韩兵器、燕兵器铭文的出土与战国金文的分域研究等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如果没有新出考古资料为依托，科学的分期断代与分区和分域研究则根本无法展开。

2003 年陕西眉县杨家村新发掘青铜窖藏，“所出 27 件器物都有铭文，内容十分丰富重要”^②。20 世纪以来的金文研究，主要是一个金文材料史料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先秦古史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的考古发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疑金文研究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以新资料的出土与发现为契机。

^① 陈絮：《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② 李学勤：《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 年第 6 期，第 55 页。

商周金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期断代。“断代”指断王世而非断朝代。此外，对周代金文的分域或分国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主要趋势之一。

一 西周金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西周金文研究可谓成就较大，在此有必要提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王年研究的新成果。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是断代工程在王年研究中的初步成果。“工程”对西周王年历谱的研究大概遵循这样的思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文化的分期与测年的验证，以及对相关历日的天文学计算，建立一个西周年代学始年（也即武王克商之年）的大体范围。同时，选择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做铜器类形学分析，判断出它们的相对年代。以此为基础结合几个关键性的支点，例如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晋侯苏钟与历王三十三年、“天再旦”与懿王元年、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昭王之年以及《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等，用金文组的方式构建出金文历谱、排出西周诸王之年代。在此基础上将各种结果进行综合与优选，从而整合出一个最佳的年代框架和西周诸王王年配置。

在已被用来排谱的六十余件四要素俱全的金文资料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铜器铭文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考古发掘或与之相关的活动中所得的，著名的如三年卫盃、五祀卫鼎、九年卫鼎、虎簋盖、元年师旂簋、五年师旂簋、散伯车父鼎、王臣簋、宰兽簋、逆钟、四年癸盥、十三年癸壶、晋侯苏钟、善夫山鼎、此鼎、此簋、五虎鼎及柞钟，等等。这些铜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为西周王年历谱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文字资料，而且为前期的器形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使得新的研究有了更为可靠的参考标准。倘若没有这些新发现，西周王年历谱的探讨是很难展开的。

二 春秋金文的分域研究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青铜器，在继承西周王朝风格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出各自的区域特色，大致可分四系，即以秦、晋为代表的西北系，以郑、宋为代表的中原系，以齐、鲁为代表的东土系和以吴、楚为代表

的南土系。”^① 我们有必要以新的考古材料做进一步的国别区分。

春秋金文的分域研究肇始于郭沫若，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下编指出，以国别为序，将所见的东周铜器二百六十一件分三十二国做了释读。尽管当时资料还不完备，体例也不算严密。但此举为以后东周金文的分国和分域研究开了个好头。其后如白川静、高明、朱凤瀚等学者也有所论及。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大量发现，如山东地区发现的莒、纪、滕、郟、齐、鲁列国之器；江苏和安徽一带则吴、越、徐、舒、蔡之器习见，河南和湖北一带则广见虢、楚、曾、黄、蔡、郟诸侯国之物，陕西则出现秦国重器，其他如晋国著名的子犯编钟的发现等，为春秋金文的分国研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材料。因此，相关的专门论著也多了起来，如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等等，皆属这方面的力作。而最为系统的资料书则有马承源主编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其中有五册是专门收录东周列国铜器的。当然，上述论著所录铭文多不限于春秋，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西周和战国甚至秦代的材料。而这些专著和资料集的出版，着实为东周金文分国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战国金文的分域与编年研究

战国时代，青铜器铭文有了显著的变化，从载体和铭文内容到文字构形，均体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尤其是字形有减笔、增笔、借笔、合文等各种复杂的现象。而且还存在字体因国别而异的现象，所以其研究素称艰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唐兰先后提出文字东西两系说的著名观点。虽说当时做此论断其材料依据还当相匮乏，然则导夫先路，功不可没。到了20世纪50年代，李学勤提出战国文字分为齐、燕、晋、楚、秦五系说，较之两系说有了显著进步，为以后战国金文的分域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继之则有何琳仪先生《战国文字通论》，对战国金文及其他文字做了更详尽细致与系统的探讨。在新出土考古材料，尤其是具有断

^① 白川静：《金文的世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07页。

代作用的战国铜器群不断出土的推动下，各区域文字的研究皆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一）齐、燕、三晋金文的研究

春秋中叶以来，齐国逐渐成为东方第一大国，受其政治势力的影响，周围的诸侯国如鲁、邾、倪，其文化趋同于齐，其中的铜器铭文就是表征之一。这些国家的文字，学界通称为齐系文字。

战国时期的齐系金文以田齐为代表，主要有铜器铭文和兵器铭文两类。其中有代表性的战国铜器主要有传世器陈侯逆盃、陈侯逆簋等等。齐系兵器铭文多见于传世器，其文字形式与三晋不同，多系铸造。通常是“物勒主名”而非“工名”，这种个性的铭文内容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他像自铭“徒某”、“散某”、“戈”作“钱”、“造”作“船”与“窟”等，皆有地方色彩，无疑有助于兵器铭文的国别判断。黄盛璋《燕齐兵器研究》是目前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其他的如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齐系文字”节亦称完备。

在燕系金文中，礼器与容器铭文较少，目前所见不到 20 件。对于这些青铜器铭文，学者李学勤、郑绍宗、李家浩、何琳仪、吴振武、王辉等间有探讨，但在释读上时有分歧。冯胜君《战国燕青铜礼器铭文汇释》^①一文集中考察了上举燕器最为系统，但某些文字的释读略有不足。此外，燕金文以兵器铭文为其大宗，兵器刻辞之富可列诸国之首。燕系金文研究中还有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铭文难释，诸多争论也由此而来。

对于三晋器的研究起步甚早，20 世纪河南洛阳金村魏器虬氏编钟和虬羌编钟的出土，便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注意。“进入 70 年代在新出材料的推动下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论著，如专门研究兵器铭文的郝本性、黄盛璋等先生的有关论著，关于三晋青铜容器铭文的系统论述有黄盛璋的《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②其他如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也有专章涉及。

战国时期的三晋铜器铭文，主要包括青铜容器与兵器两大宗，还有少数则是可以与容器做配套研究的衡器等。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

^① 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中国古文字研究》第 1 辑，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3—195 页。

^②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编：《古文字研究》第 17 辑，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66 页。

容器与衡器有四十余件。其中较著名的器物有梁十九年鼎、梁二十七年四分鼎等等，以传世器为主。此外是“物勒工名”，有监造、主造与制造者之名号作为考绩的依据。而一件完整的铭文一般包括五项内容，即造器的时间、造器的地点、造器之人（监造、主造、制造）、铜器的容量与重量以及置用地点。如梁三十五年安令鼎铭文曰：“卅五年安令周共、视吏狄、冶期铸，容半鬻，下官。”但多数铭文所含内容只有二到三项。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的官制、历史地理、公官监造制度、度量衡制度和书法款识等内容皆有重要价值。

三晋兵器以新郑“郑韩故城”所出土的韩国兵器为大宗，有铭文者达170余件，但资料公布并不完整。赵国兵器铭文有40余件，以传世器为主。魏国从兵器为主，魏国兵器铭文有近20件。铭文多记造器的时间与造器人，并涉及地名、库名与职官名，如“廿年，郑令韩恙、司寇吴裕、左库工师张阪、冶赣”，而制造者称“冶”则是三晋器铭的重要特征。

（二）楚系金文的研究

楚器金文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的发现成为研究展开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鄂君启节的出土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曾侯乙墓的发掘，则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从此楚器铭文的研究步入鼎盛期。

楚系文字中还有一类有“鸟虫书”之称的独特兵器铭文，这些文字在历史上曾被误认为夏代文字。为纠正其谬，学术界有多篇论文专论使其明晰。楚系文字涵盖广泛，学术界通常将江汉流域、随枣走廊一带的姬姓封国之文字，以及江淮流域下游的吴、徐、舒文字，乃至江浙地区的越国文字都归属于此。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积累，吴越地区的战国金文也逐渐成为学界单独研究的对象，如曹锦炎《吴越青铜器铭文述编》、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等等，即是这方面代表性成果，对今后建立更细致的文字区系框架当有裨益。

李零先生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东周时期的典型楚国铜器群》和刘彬徽先生的《楚系青铜器研究》等等，都是关于楚系文字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秦金文释读与编年

秦金文的著录始自北宋，自王国维提出了文字东西两土说以来，秦

金文更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李学勤先生《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①一文，可谓该领域比较系统的奠基之作。

“战国时期的秦金文主要包括三项，即量权、兵器与虎符，其中权量与兵器铭文是大宗。这或许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重视耕战风气的折射。”^②嬴政统一天下之后，将秦的度量衡标准推向全国，并制发了大批度量衡标准器，甚至在商鞅方升上也被再次加刻诏文，秦人的务实精神及对度量衡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陕西、甘肃一带常有战国量衡器出土，如咸阳鼎、私官鼎等等。从铭文看，容量单位有“斗”“升”等，重量单位有“斤”“两”“铢”等，长度单位有“尊（寸）”，很有地方特色。量权铭文一般记有监造人、主造人、制造人、时间、地点、容积及重量等内容，成为研究战国经济史及多级监造制度的重要资料。

战国早期的秦系兵器十分罕见，至中期以后则大盛，仅纪年兵器铭文一项，已刊发者就达四十余款。如大良造鞅戟、十九年寺工铍等，其铭文格式一般由监造者、主造者、铸造者的名号构成，已经从此前的“物勒主名”发展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对于秦国兵器铭文，很多学者作过研究，其中最系统的论著主要有袁仲一《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③。收罗材料详备分析精细。值得一提的是，王辉依据秦国纪年铜器撰成《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一书，“是秦铭文研究中很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新世纪2003年台湾学者陈昭容所著《秦系文字研究》”^④，填补“秦系文字”无学术专著空白。

相对而言，燕和齐金文研究还显得薄弱，很多问题只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但是总的看来，东周青铜器铭文的分域与编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战国金文的相关研究，可谓已构建良好体系。而今后可以用力的方向是借鉴西周铜器铭文中比较成熟的相关理论和手段，

① 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②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5页。

③ 《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5页；《古文字研究》第21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7—285页。

④ 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台湾长达印刷有限公司2003年版。

并且充分利用同时代的其他文字资料做横向比较。

第二节 对两周金文构形研究的认识

一 思路的形成

20世纪以来的金文研究硕果累累，在各项专门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刘钊先生提出的“古文字构形学”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自此以后，运用构形学理论研究西周金文构形、春秋金文构形、战国金文分域分国文字构形的论著时有问世，对各种文字构形现象的认识渐趋深入，不少带有规律性的认识逐渐明朗化。

笔者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研读了关于古文字构形学的相关论著，在导师何琳仪先生的具体指导下，逐渐认识到构形学理论不仅对于古文字考释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诸如古文字繁化、简化、讹变等构形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以及对文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影响。鉴于目前关于古文字构形理论专题研究多，如果仅选取西周或春秋、战国、秦汉中的某一阶段展开研究，不仅无助于两周金文的综合研究的深入，也会失去其广阔的研究空间。由西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中国社会经历了由统一到分邦、到分裂、又回归统一的历史巨变，社会动荡剧烈。反映到文字构形上也经历了由典雅华贵的贵族统一文字形体，再到分封邦国区域性文字构形显示出特点，到分域分国文字形体的形成，到秦小篆的文字构形统一的大趋势。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的研究上起西周，下迄于秦统一（原则上不包括秦代），以“两周金文构形演变”为题。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对这一历史阶段金文构形的重要现象展开具体分析，以期得出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的最基本规律。

二 所依据的古文字构形理论

刘钊先生曾指出：古文字构形学是研究古文字的产生、构成及其发展演变的学问。既然称为“构形学”，就是指研究古文字的形体构成。形体构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原始形体的构成原则，即选择用什么形体来记录语言的理念和方式；二是形体发展演变的规律，即形体

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平面的，静态的；一个是历时的，动态的”^①。古文字构形学强调以形为主的分析考释方法，注意文字产生和发展中的各种趋势和规律，重视“表音”这一特性在文字构成演变中的枢纽作用。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字中的繁化、简化、变异、音化、美化等问题。这里的繁化、简化和变异是文字形体演变的趋向性的主干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已有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文字的图形符号和它所代表的语音的矛盾、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的矛盾、文字结构本身的矛盾、文字结构和书写方向的矛盾、简化和繁化的矛盾，是文字本身内部的五对矛盾，其中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的矛盾是这些矛盾里的根本矛盾。”^② 黄德宽先生所倡导汉字构形方式动态分析的文字学理论，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汉字构形方式是一个隐藏于汉字符号系统背后的深层的系统，其发展演进实际上是汉字体系发展演进的本质反映”。^③ 这是本文揭示各种构形现象内在原因所遵循的基本理论。

当前的古文字研究呈现各种专门研究愈分愈细，研究手段愈来愈多样化趋势。尤其是“以计算机为手段的汉字构形史研究”^④。为两周金文构形在宏观上把握字量和字素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积极作用应给予肯定。

古文字构形学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不仅有古文字学上的理论意义以及指导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实践意义，同时还有出土文献整理的历史考古学作用。前人在此留下许多可资借鉴成果和经验，新时期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然而要看到同古文字研究整体学术发展相比，关于构形学的研究还显得很薄弱，研究的问题和角度还不够多样，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③ 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相关论述又见《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 王宁、周晓文：《以计算机为手段的汉字构形史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